

1268

珠江改造資料

第一



SF



47250 /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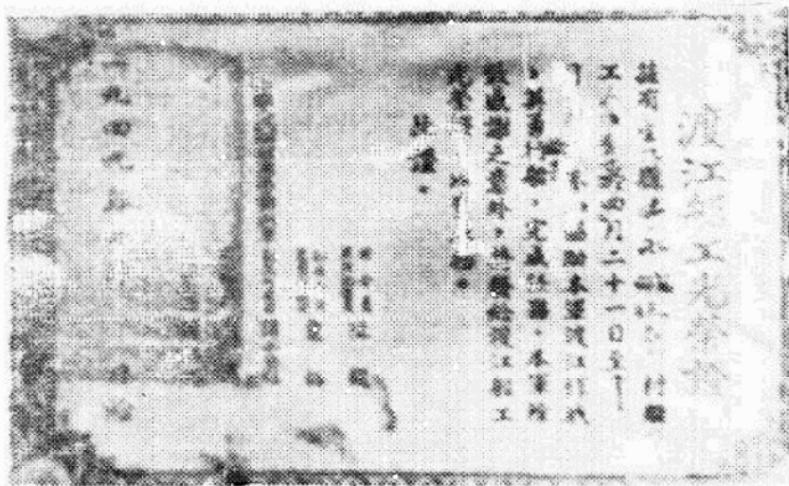
下为民国三年（一九一四）十二月四日上海《时报》所载韩伯棠烈士等殉难的影印件

(四)

卷之三

蘇州城內三多巷口山源茶館，二次赴會，同提防。討袁軍旗幟泥塑作彈藥物，以備不時之需。韓伯棠方遇厚張超唐榮李英于寶大寺七石橋上，同赴蘇州。張超等先由浮羅道後所致，雖尹公業無私送，於過江，皆乘船往。蘇州城內各市鎮不論，七人中者，張超實性情好平素體，榮身頗有官氣，韓伯棠則曾入陸軍小學畢業，下顎自蓄供養，頭髮剪短，手執皮尺，腰帶皮帶，全副戎裝，取講義一書，常穿西服，因在身上穿了將軍服，故有日本兵稱呼。蘇州人，才心智固有過人，而其外觀，又極似中國人，故有此稱。日暮，甘心從逆應即拔照軍法辦理。即日行駕發，至十二月一號，天下雨，猶未立曉，卻天明，一搭你來，驗明正身，押赴土磨基操場當場槍斃。鍾名也，寄二名，其孫子貢田二名，刑罰下未決，仍舊押回，收禁問候。只極刑之罪犯，二人名為活潑，所判變鬼，遇土造回，由是御五花八門之大魁，至今日遂作一結。東北亂，蘇州自管。

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颁发的渡江船工光荣证



(县档案局供片，王松林翻拍)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前 言 | 1 |
| 辛亥革命后的望江简况 | 3 |
| “五·四”运动中望江学运二、三事 | 曹 平 7 |
| “五·卅”运动在望江的反响 | 晓 林 11 |
| 望江人民支援大军渡江概述 | 桐 梓 13 |
| 桂蓬率游击队到望江 | 胡师瀚 21 |
| 彻底取缔大刀会 | 万玉华 22 |
| 怒制洋人 | 文 川 28 |
| 1905 官洲锄匪记 | 文 川 31 |
| 一九三四年望江旱灾记略 | 宋静源 37 |
| 日寇在望江的暴行 | 晓 林 徐 远 40 |
| “八·二六”日寇扫荡记 | 夏泮东 43 |
| 太阳山下 痛歼日寇 | 徐 远 45 |
| 大刀会动乱目击记 | 何笠亭 48 |
| 朝阳庵与乩坛 | 帅银涛 53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望江竞选“国大”代表见闻 | 檀 钟 | 57 |
| 一幕恶作剧 耗银六百圆 | 丁 东 | 61 |
| | | |
| 辛亥革命烈士韩伯棠事略 | 童柏林 | 67 |
| 简话陶太平 | 刘陶然 刘贤臣 | 71 |
| 梁金奎其人 | 何笠亭 | 77 |
| | | |
| 望江南界变迁简况 | | |
| ——从“南连彭蠡”，到“南滨长江” | 刘道源 | 80 |
| 窑头村简介 | 何仲棠 | 85 |
| 滨江古镇——华阳 | 丁育智 | 88 |
| 雷阳书院 | 县教育志编写组 | 98 |
| | | |
| 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片断回忆 | 何祚光 | 101 |
| 江浙边区游击队始末 | 沈钟英 | 106 |
| | | |
| 汪公坟佚话 | 周大鸿 林国材 | 111 |
| 乡里轶闻拾零 | 夏泮东 | 113 |
| | | |
| 地舆赋 | (清)汪锡福 | 116 |
| | | |
| 《望江文史资料》征稿启事 | | 129 |

前 言

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，是现实的一面镜子。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，便是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，从事史料的征集、校勘和编印出版，为建设两个文明提供重要借鉴；为向广大群众及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，为编史修志提供基础资料；并通过撰写史料，广泛联系团结各方面人士，进一步巩固、扩大爱国统一战线，促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。

撰写文史资料，当“存真，求实”，秉笔直书。举凡上起戊戌变法，下迄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，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教、科技、工商、民族、宗教、华侨、外事乃至社会生活、风土人情、三教九流、人物佚事等方面，均属征集范围；征集的重点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和群众革命斗争方面的史料，“敌”、“友”方面的史料。另外，对于本地的湖光山色、古史今谈、社会轶闻、民间传说等，也予酌情兼收，以便为考古溯源、勘藏探宝，提供一些蛛丝马迹。但文史资料有别于正史，它允许一鳞半爪，允许多说并存，并通过印发和交流，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充实与匡正。

望江，位于长江之滨，山川秀丽，历史悠久。据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赛口汪洋遗址，查明早在六千多年以前，我

们的祖先就劳动、生息、繁衍在这块土地上。勤劳勇敢的先民们，迈过漫长曲折的历史道路，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，为我们创建了革命传统、灿烂文化和宝贵遗产。一九四九年以來，望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，建设了锦绣山河，望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记下历史的光辉足迹及其道路的坎坷，使之有益于当代，惠及于后世，这是当今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。但，春华秋实，岁月如流，知情者大多年事已高，抢救文史资料，实属当务之急。承各级领导重视，各界人士积极撰稿，有关部门和同志热情协助与支持，我们得以如期地编印出这辑文史资料，在此一并致以谢意。由于我们知识浅薄，水平有限，资料中错误和缺点，定然难免。读者的批评指正，各界人士继续踊跃撰稿，文史资料续辑不断印行，都是我们的殷切期望。

《望江文史资料》第一辑同大家见面了，尽管它的内容和形式都还很不完善，但它却是从肥沃的乡土中拔地而起的，它那咿咿诉语的亲昵乡音，会使大家产生联想和记忆，辛酸和悲戚，喜悦和振奋。愿全县人民、政协委员及各界人士，给以精心哺育和热忱提携，使之在回首往事、启迪来者、振兴中华、建设家乡的事业中，奉献出不渝的忠贞和竭力的辛勤！

辛亥革命后的望江简况



一九一一年，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以后，望江县政府下设三个科：第一科管内政，第二科管财政，第三科管司法。另设有征收员、收发员等。还有警察局，局长称警佐，下设巡官、巡长。一九一八年，徐世昌当总统的时候，望江县知事改称县长。

民国元年以前，望江有十三寺，即：太慈、菩提、十里、土岗、永兴、泉塘、法华、褒隐、张山、龙城、妙光、武洲、南台寺。县城的青林寺不包括在十三寺之内。各寺管区的大权都为士绅所掌握。下层设有地保。满清推翻以后，全县划为五个行政区，不用寺的称呼。第一区辖县城、十里、边江等地；第二区辖太慈、菩提；第三区辖南台、土岗、永兴；第四区辖泉塘、法华、褒隐；第五区辖张山、龙城、妙光、武洲。区里的大权掌握在士绅手里。基层有甲长。县里有议会，议长是我父亲龙师亮，付议长是史步扬。约在民国三年，县议会改为财政局。民国五年后，又设立商会，正、付会长是陈尚廉、萧之桢这些钱店老板。民国九年，又添设农会，会长是史丹生。民国十年，安徽选举议院，望江选余节高和聂步遂。本来是选两个，结果只选一个。我的选票卖给了怀宁人，得了一千一百元，这是一次贿选。

民国元年后，望江仍同满清时代一样，士绅的权力大于一

切，民众都得听士绅和地主的指使，乡间纠纷、诉讼，均由各地士绅、地主把持，弄得乌烟瘴气。当时，城里当权的陈尚廉、萧之桢、龙尧卿、韩锡吾四大家，他们收租放账，剥削人民。此外，还有一区的刘步瀛、刘聘珍、宋伯庸、宋梓臣、宋作干、倪惕生；二区的童敬涛、余从简、余合浦、徐裕培、徐怀瑜、童志樵；三区的刘学渊、陈知白、范翰成、周爱施；四区的廖学凡、曹少怀、何良俊、孙堂名；五区的聂步遂、胡沙瑞、檀月乔、曹銮翔等；以后还有些新发户。他们或掌全县，或管一方，任意剥削小商和农民。剥削手段很多，遇到天灾人祸，穷人没吃没穿，就向他们借贷，而后用农作物或货物作抵，利息从五分到加一。向国家交纳钱粮，凭管事的人算多少就是多少，农民不识字、不识算，只有听任他们剥削。另外，政府还有烟酒税、屠宰税、契税等等。有时，政府还出签派差，帮助士绅要钱要粮。各地公堂庙宇收入的稻谷，都落在士绅手里，人民不敢过问。对商人则抽取厘金，有百货厘、米厘、盐厘、瓷器厘等等税收。抽厘时，扦手是个关键，完税多少由扦手用签子量深浅确定，其弊更大。

民国四、五年间，文化教育方面设立劝学所，首任所长是金献书。民国六年设县视学，是我担任。城内办了一所小学，只有一个高级班，没有初级班。华勇卿、徐奕成、师亮、周疆、余从简、余合浦、檀月乔、史象方等都先后担任过校长。学生人数不多，所以劝学所长和视学员都没有什么事情做。乡村只有范氏、余氏祠堂各有一所小学，社会教育更无从谈起。再就是县城、赛洛桥、长岭铺都有外国人设的天主教堂，传教人爱干涉地方事务，这是以传教为名，进行文化侵

略。

民国以后的社会风俗，与满清时候一样，男女婚姻都由父母包办，青年无权作主。城乡都欢喜抱童养媳，又叫等郎媳。父母婚后还未生育，就抱别姓女孩作儿媳，结果是男小女大，夫妻不和，产生恶果。幼女都包小脚，深受痛苦，这是封建专制时代对女子的虐待和摧残。人与人之间发生纠葛，就请乡绅到公堂或寺庙评理，先是吃喝，然后说话。这时，乡绅各持所见，互相攻击，趁机挑拨是非，从中渔利，致使纠葛双方倾家荡产。最厉害的是请“族尊”开祠堂门，谁要犯了家法族规，“族尊”就有权绑吊、打扁担，直至毙命。

一九二四年（民国十三年），国共合作，北伐军由广东出兵武汉。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柏烈武（柏文蔚）派师长李振亚到安徽组织军队。李振亚到望江，住在财政局。财政局和商会联合，先召开了欢迎会，后在明伦堂召开了群众大会，萧之桢、邹书乔、史丹生、倪惕生、聂步遂等人都参加了。因为北伐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，解除人民痛苦，他们谁也不敢说话，只有宋心一、檀迪凡和我在会上说了话。我们的说词是：人民被专制日久，痛苦很深，北伐军到来，象是医生的一付清凉剂，使人民得有脱病之日。当时，士绅们都觉得我们的说词激烈，但没法攻击我们。李振亚在望江住了个短时期，派倪惕生当华阳厘金局长，我任付局长。他走以后，我经徐介卿介绍，到武穴三十三军去了。民国十六年夏季，我随三十三军从武穴到安庆。安徽的国民党筹备委员会要派人到望江，徐介卿（三十三军参谋长）就介绍我到三十三军特别党部，同杨积成、徐介白、檀迪凡、刘德熙五人一起，到望江组织国民党筹备委员会，杨积成任常

务委员，其余都叫执行委员。我们在望江开了好几次会，又成立了妇女协会，还清算了一部分财政局的账目。局长邹书乔、副局长史丹生贪污了两千多元，我们实行短期押追。后萧之桢等人出来担保赔偿，拖延了事。五区士绅聂步遂，绰号“河北王”，一贯骄横跋扈，出入前呼后拥，民众和其他士绅对他都畏如虎蝎。我们决定打倒他。正要动手时，忽然接到省党部消息，说蒋介石叛变，宁汉分裂，国共不相容。地方士绅立即主张推翻我们的筹备委员会，鼓动宋心一、欧兰臣等率领人众将筹委会捣毁，我等只好各自分散，筹委会到此终结。约过两月时间，省党部改为“改组委员会”，委派宋理文、金镇洋、史时和（都是本县人），还有一个合肥人，一个桐城人，来望江组织改组委员会，进行清党。

这个时期，县政府知事已改称县长，以前的一、二、三科改民政、财政、建设、教育、司法五个科。军事方面设警备队，有队长、中队长，归县长统管。原先的劝学所，改为教育局，开始管理经费，其来源是收取租谷，并征收教育附加费。县以下为五个行政区，有区长、保长、甲长。各种税款都有附加，增加人民负担。社会上开始宣传女子不包脚、不抱等郎媳，但乡里的户族统治习惯依然和以前一样。县长有事要询问大士绅，对地主、资本家也照旧支持，他们共同剥削农民和小本商人。民国十六年以后，区长以下添设了联保主任，管理保、甲长，并添设壮丁队，由区长管理，目的是对付共产党运动。那时（民国二十年左右），有叶仁山、孙敬纯等共产党人组织活动，地方绅士何仿文等勾结国民党党部的金镇洋与县长冯熙周（广东人），派警备队长高希亮等去搜捕共产党。后孙敬纯被捕遭杀害。（根据龙伯陶遗稿整理）

「五四」运动中 望江学运二三事

曹平

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列强召开巴黎和会，决定由日本接收法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，丧权辱国，举国哗然。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，北京学生数千人，在天安门前集会，高呼“外争国权，内惩国贼”等口号，举行游行示威，遭到军阀政府的镇压，逮捕爱国学生三十多人。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，得到了全国的响应和声援。在五月八日安庆三千多学生举行游行及五月十八日“安庆学生联合会”成立之后，望江在安庆读书的学生也组成“望江旅省学生联合会”返回本县，开展宣传，发动教育会、商会、农会、财委会等各界在雷阳小学举行集会，声援北京学生，讨伐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政府。会议通过了响应“五·四”运动的快邮代电，并举行游行示威，高呼“收回山东半岛！”“德国人在中国强占的一切权利，一定要交还中国！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等口号。

游行示威，是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斗争形式之一。望江在“五·四”运动中，曾先后组织了五次示威游行。我的父亲很幸运地参加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。他在生前，曾常对我津津乐道这场运动的动人情景。父亲学名曹霆，号雷生，本县赛口人，生于一九〇一年，一九一九年时在雷阳小学读书。跟我父亲同时进入雷阳小学读书的有曹祥、曹坤和汪旭等人，他们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。另与他同时读雷阳小学的，还有会拉胡琴会吹箫的史时杰（又名史伯英）和后来为刘迈

所杀的童碧华。

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至一九一九年“五·四”运动，中国对外的关系史是饱尝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血泪史。帝国主义在对我们进行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侵略的同时，还实行文化侵略。文化侵略是糖衣毒药，不流血，不易于感受切肤之痛。故有的人受其麻痹，幻想步入“天堂”。望江也设有天主堂、圣公会，那些主持传教的洋人，飞扬跋扈，仗势欺人，肆行无忌。“洋人犯法官难管，洋人犯法官不管”，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奇特而又见惯的现象。许多有识之士及爱国学生早就义愤填膺，跃跃欲试。“五·四”运动反帝的革命浪潮，激起了雷阳小学师生的义愤，他们立即行动起来，要找洋人算账，算账的目标便是圣公会和天主堂。大家决定先打天主堂，齐集全校师生二百多人，排成长队，推举身材高大、膂力过人的曹祥，高举大旗，走在队伍的前列。师生们拿着红绿纸做成的小旗，踩着学校军乐队鼓、号的节拍，先在街道游行示威，然后朝着北门天主堂挺进。街道青年、居民、商人及四乡上街的农民，也纷纷加入行列，队伍越拉越长。当队伍冲进天主堂时，曹祥便把那大旗杆横地一扫，那尊正对大门的“圣象”顷刻仆倒于地，碎成几截。这时，一个穿黑衣的“神甫”仓皇奔来，嘴里叽叽咕咕，不知在说些什么，早被学生推倒在地。另一个女神甫吓的嗷嗷直叫，朝后屋跑去。没多时，那大大小小各种姿态的“圣象”，全被砸得狼藉于地；那被打碎的窗子玻璃、五颜六色的传教单及成捆成捆的“圣经”小册子，撒得满地都是。几个男神甫在学生的严词训斥下，垂头丧气，哑口无言；在后面走廊下的两个女神甫，蜷缩一团，嘤嘤对泣。骄横跋扈、

不可一世的洋人，被爱国青年运动的气势所慑服，呆若木鸡，威风扫地。

打了天主堂之后，学生又乘胜前进，直奔西门的“圣公会”。圣公会的大门早已紧闭，学生们于是翻墙的翻墙，撞门的撞门。大门终于被打开了，一个肥头腆肚的神甫走了出来，问学生有什么要求、条件。学生们只顾打东西，不听那一套，因为他们当时主要是为了迸发心头的义愤，横扫洋人的威风，让洋人领略领略望江儿女敢于向帝国主义奋起冲刺的精神。

以上是我父亲常同我谈的他们当年“闹”的反帝的一次风潮。彼时还“闹”的另一起风潮是捆“河北王”聂步莲。聂步莲是望江“河北”（鸦滩河以北）聂家花屋人，排行第三，人称“三先生”。此人在满清时期也只鬼混了个“黉门秀才”，但他善于钻营拍马，至一九二二年，攀上了当时安徽省督军马联甲，做了马的干儿子。有了这个后台，他便肆无忌惮了。他为人阴险诡谲，两面三刀，手段毒辣，且喜冒作诗文，要弄刀笔，包揽诉讼，肇事生非，强词夺理，仗势压人，场场官司场场“赢”，以此霸占田地、山头、河湖水面和柴、草厂等等。他在安庆马联甲那里仰承鼻息、摇尾效命时，据说曾叫四五辆土车，推着银元、铜钞回家过年，阔绰豪华，大有一掷千金之势。对于聂的劣迹和妄为，雷阳小学的师生，早就耳有所闻，目有所睹。正当他们取得打天主堂和圣公会的胜利、无限欢欣喜悦之际，有人到学校里传了一个“奇闻”，说是聂步莲在宝塔河雇船，要到安庆去把望江的日头卖给洋人，又由他从洋人那里承包下来，在望江范围内征收“日头税”，凡是需要日头晒的东西都要纳税，妄图

借助洋人的势力，榨取民脂民膏。雷阳小学师生听此奇闻，怒不可遏，纷纷结队奔向城外宝塔河去捉那个“贪天卖日”的“河北王”。停泊在宝塔河旁的许多船只都查遍了，未见聂步蓬；忽遇一老渔翁暗中报信，说聂躲在他的船上。当学生们把聂从船上押上岸来时，却不是平时那个头戴瓜皮帽、身穿大长袍、衣冠楚楚、盛气凌人的“三先生”、“河北王”，而是一个蓝衫敝履、惊惶瑟缩的“渔人”。学生们见聂妄图化装出走，更添气愤，便从船上借了根粗索把聂捆了起来，示众游街，人心大快。

除闻先父所述的这两次“风潮”外，我们还听说为了抵制日货，学生们当时还对商店普遍进行了检查，将日本商品打上了“暂时封存，不准出售”的戳记；在华阳码头，学生们建起了宣传点，号召中国人不乘日本轮；在学校里，废除经学，改革语文教学中单一的文盲体，推行白话文等等，开始冲决封建的和帝国主义奴化的网罗。

“五·卅”运动在望江的反响

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，上海学生和群众举行反帝大游行，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工人顾正红，逮捕宣讲学生和反对增加码头捐、实行交易所注册等所谓“四提案”。当游行队伍聚集南京路老闸英国巡捕门口时，遭到英帝国主义巡捕开枪镇压，酿成“五·卅”惨案。当夜，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，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，发动工人罢工，学生罢课，商人罢市，一致向帝国主义反击。接着，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，用各种形式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，支援上海人民的斗争。

在安庆“五·卅”惨案安徽后援会的号召下，望江人民也积极行动，募捐筹款，支援上海罢工工人和抵制英货、日货。望江教育界首先行动，以雷阳小学为中心，成立有教育、商会、农会等团体参加的“五·卅”惨案安徽后援会望江分会。分会下设募捐队，开展宣传和募捐活动，并挑选青年骨干倪苏贻、童璧华、宋理延、史时和等十人组成义勇队，直接办理收款事项。募捐队每到一处，就向群众宣传帝国主义在华杀我同胞、辱我国体的罪行，号召全县人民都要支

海罢工工人，抵制英货、日货，实行对日经济绝交，从而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反帝热忱。各商店对日货进行登记查封，抵制日货的波澜很快席卷全县城乡。

然而，后援会望江分会的委员中，有几个是望江的商业巨头，他们虽被卷入了反帝的浪潮，却都惜钱如命，对捐助上海工人很不热情，甚至玩弄手段。当义勇队安排募捐计划时，萧广兴钱庄的老板萧子桢，便推龙合丰商店的老板龙尧钦先作个样子。义勇队便向龙尧钦提出捐款三百元，而龙尧钦只捐给五元。义勇队反复讲理动员，龙依然分文不加，因而激起了义勇队的愤慨，要求县长王膏如（因王与土豪劣绅滚在一起，人们给他一个绰号，叫“王膏药”）签发拘票把龙尧钦抓起来。王膏如无奈，只好发出拘票，但消息很快传给了龙尧钦，使龙得以藏匿起来，王膏如也就两方敷衍，不了了之。萧子桢见龙尧钦如此，也就捐款甚微。到这时，义勇队的年轻人方知受骗。由于受到龙、萧等富商豪绅的干扰，最后全县仅募集捐款五百元，汇赠上海总工会。（晓林整理）